

到底是贫穷、饥饿而又绝望，还是 享有特权、装腔作势而又苛求于人？

——寻找‘博士’的真正意义

凯西·M. 纽曼

几年以前，我听了小说家汤姆·沃尔夫在耶鲁大学对一群研究生和教员所作的讲演。沃尔夫是耶鲁大学1957届美国学博士毕业生，他的讲话一开始讲的是他在位于纽黑文的研究生院里的几个故事。不过他解释说，他的故事甚少，因为研究生院既不堪回首又难以表述。他（略微逗人发笑地）指出，从未有一部描写研究生院的小说，以此作为他的论点的证据。

在沃尔夫讲话的时候，我正在写一篇论文，谈的是在学院小说的类型中对高等教育的展现（学院小说这个类型由于像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和欧文·约翰逊的《斯托弗在耶鲁》这样的经典之作而出名了）。我为沃尔夫的问题所困扰，同时又拥有了一个有关425部学院小说的描述性的书目，因而也就决心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对的，搞清楚是不是现存并没有描写研究生院的痛苦和磨难的小说^①。

我发现，沃尔夫错了——起码从技术上讲是错了。是有几部描写研究生生活的荒诞而又有趣的小説，我特别喜爱的一部就是1939

年出版的《博士的口试》。我喜欢它，因为其主要的戏剧性场面——它起码占了小说的一百页的篇幅——的背景，就是学位考试中的口试。情节围绕着两个危机展开：在主人公所在的英语系进行口试的那个上午，主人公得知，他的女朋友（也是研究生）怀孕了。接着他收到了一封电报，告知他，他要是通过口试的话，就会获得在附近的一家学院的一份工作。在考试结束的时候，答辩委员会的7位教员就是否应该让他通过而有了分歧。最后，来自经济系的特邀主考人，出于对这个学生对德莱塞的小说《金融家》的阐释的欣赏，也就从有利于他的方向打破了这个平局。我们的主人公通过了考试，得到了工作，并且留住了那个姑娘——更不必说那个婴儿了^②。

但在一个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沃尔夫是正确的。并没有一部描写研究生生活的原始型的小说，也没有一个研究生相当于欧文·约翰逊笔下的丁克·斯托弗或者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阿默里·布莱恩。鉴于近来人们对别的进行培训的专业人员给予了大量的关注，研究生也就似乎尤其受到了冷落。如果说学医的学生有他们的迈克尔·克莱顿、学法律的学生有他们的约翰·格里沙姆的话，那么研究生就没有一个相应的诗人把研究生的可悲的生活给暴露出来。

在研究生确实出现在通俗文化中的为数甚少的几次中，他们确实看上去是相当可悲。在1976年上演的戏剧《马拉松选手》中，达斯廷·霍夫曼扮演了一名研究生，其绰号是“无足轻重的人”。在《羡慕的条件》中，德布拉·温格的遭遇而又好骗人的丈夫在影片的开头是一个研究生，到了影片的结尾才有了婚外恋。在恐怖影片《毒品贩子》中，有一位研究社会学的白人女性研究生，她研究的是城市的传说，她意外地遇见那位有着城市传奇人物之称的好斗的黑人毒品贩子，不久就被指控为犯有伤害罪。在电视连续剧《贝弗利山庄90210班》（以及那部短命的《96届学生》中，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研究生助理教师，他们不那么可怕，但却同样邪恶，他们都勾引

他们所教的一年级学生^③。

虽然我不能否认这些形象的可怕的幽默（以及恐怖），但我把他们提供出来却不仅仅是为了博得一笑。确切地说，我在通俗文化中对研究生的反面的展现，以及他们在大学里的政治展现的问题之间，看到了某些联系。随着研究生在通俗文化中出现得更加频繁、更加显眼，他们也同时在学院的校园里出现得更加频繁、更加显眼，其中就包括要求有更好的待遇和更多的权力。在展现中的这两个孪生的动乱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难以限定的；如果说在对研究生的文化展现中有“危机”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像研究生院自己一样古老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在对研究生的政治展现中的危机则显得相对是新的，因为全国各地的研究生们已经在组织起来，为的是对影响他们的生活的大学决策能拥有更大的控制，这主要是通过组成助理教师工会。

在这些展现——以及组织工会——中的问题，与我的利害关系是个人性质的。我在耶鲁当了6年的美国学研究生，在这一期间我是组织研究生学生会的运动的一个领导人。我试图既改善对耶鲁的研究生的文化展现以及政治展现，这是组织研究生学生会的努力的一个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各个问题之间是密切相关。当我们为能在大学里获得更大的政治展现而斗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与对研究生的反面的和传统的展现进行斗争（有时则是在对研究生的反面的和传统的展现之内进行斗争），那种反面的和传统的展现不仅见于更为广泛的通俗文化上，而且也见于本科生所办的报纸，见于幽默画、文学杂志，以及大学校方的交谈之中。

我将把耶鲁的研究生工会用作一个个案研究，来更加彻底地探索在研究生的文化展现和政治展现之间的关系。我将从在过去的25年里对研究生的某些通俗的描绘开始，目的是试图说明传统的看法是什么，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其次，我将表明，大学的官员、本科生以

及教员，是怎样使用对研究生的占主导地位（同时又是反面的）形象，来败坏他们要在大学内获得更大的政治力量的尝试的名声。第三，我将检查在耶鲁的助理教师的组织工会的运动中，而对研究生所做出的某些展现，为的是表明，这些形象嘲弄了，或者是完全重新塑造了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刻板模式。最后，我将对耶鲁的研究生的工会运动的影响做出猜测，须知耶鲁的研究生工会运动与全国各地的大学的研究生工会运动一起，对在通俗报刊里的占主导地位的研究生形象产生了影响。

研究生的悖论

除了恐怖影片和《贝弗利山庄 90210 班》之外，不论是在大学之内还是之外，研究生的最流行的形象，就是那个穿着黑色的毕业礼服、戴着黑色的学士帽的学生。我们在卡通画里，在 6 月份的报纸里（在 6 月份人人都“毕业”了），看到这个形象，这也是大学情况介绍手册里的形象。如果礼服和学士帽表明是大学毕业了，那么在她的这个研究生生涯中她就是停留在过去，总是在重温她的大学通过了的仪式的胜利。而另一方面，如果礼服和学士帽标志着某个未来的毕业，那时将获得博士学位，那么这这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局面。研究生并不是在朝后看，而是在等待：盛装打扮好了，可是还要等上 6 年的时间。

也许，如果我们把这个形象解释为，它意味着研究生是在两个毕业之间暂停了，那么这个形象的悖论也就得到了解决。学生必须从大学毕业，才能进研究生院，她必须一直是研究生，一直到第二个毕业——博士毕业——时，才算结束。大学毕业开始了研究生的生涯。研究生院毕业将结束这个生涯。

问题在于，暂停上 6 年或者 8 年，在任何事情之间都是一个长的

时间，更不要说是在两个毕业之间了。在这个国家里有几乎 50 万文科和理科的研究生，文科获得学位的居中的时间是 8.3 年^④。虽然对学生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过长而又难以忍受的过程，但对更大数量的公众来说却是高深莫测的。人怎么能在学校里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可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学？确实，我的学位项目的长度是巨大的忧惧和困惑的一个来源，这不仅对我本人来说是如此，而且对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朋友、以及我的祖母来说也是如此。（她们的问题分别是：你什么时候结束？完了之后你要做什么？你什么时候结婚？）

不仅我的家庭里的女家长们（以及她们的朋友们）是如此。如果通俗文化是一种尺度的话，那么公众对获得博士所需要的时间是惊骇的。我认为，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研究生在通俗文化里经常被描绘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或者是失败者。除了学士帽之外，研究生的最流行的形象大概就是那个典型的乏味的人：又瘦又驼背，戴着眼镜，带着袖珍保护器。聪明，但却局促不安，在女人面前尤其是如此。这个形象在 1976 年的经典的《马拉松选手》中，被达斯廷·霍夫曼完美地体现出来了。霍夫曼所扮演的那个人物托马斯·巴宾顿·利维，一方面在训练跑马拉松，一方面又在写他的论美国政治中的暴政的论文，这时他的哥哥出现在他的门口，被刺死了。接着利维就被拖入一个复杂的阴谋的网之中，那场阴谋涉及到一个施虐狂的纳粹分子牙科医生、一个满是钻石的保存贵重物品的盒子，以及政府的特工机构。研究生院从来也没有这样惊心动魄，而论文也在混乱中丢失了。

在达斯廷·霍夫曼所扮演的人物为他哥哥的死亡而复仇，战胜了真实生活中的暴政的时候，影片中的那个占主导地位的形象仍然是作为一个衣服凌乱、筋骨结实、傲慢气盛的马拉松选手的霍夫曼。他的拉丁美洲人邻居们称他为“讨厌的人”。他也许能追到一位著

名的纳粹，但他的运动衫上面却有洞。更糟糕的是，他的房间是一团糟。他学的是什么呢？除了对他自己以外，他还会对什么有贡献呢？甚至他的导师，一位名叫比森撒尔的教授，也怀疑博士的使用价值，他告诉他的研究生们，他希望他们全都不及格。“历史学家并不缺。我们就像灌香肠一样给你们灌输知识，你们也完全是聪明的。唔，我要说，够了！我要说，让你们到别的地方找工作吧。”我们不知道利维是否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工作，在他的英勇的跑步追逐之后，我们在校园再也没有看见他。影片的结尾就像开头一样，是利维在围着一个水库跑^⑤。

我以为，这部影片出现在 1976 年决非偶然，当时正在开始对战后的研究大学的扩张进行控制^⑥。尽管在这个国家每年所生产出的博士的数目从 1963 年到 1974 年之间增至 3 倍，博士的生产在 1974 年达到了高峰又实际上降低了，直到 1988 年每年生产的博士的数目又最终达到了 1974 年的水平，又开始增加了^⑦。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博士产量的减少以及学术性工作的短缺，研究生当出租车司机的形象也就成了新的后工业主义的文化象征——那是一个就像大萧条时期在街角的苹果小贩手推车一样陈腐的形象。为《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撰稿的通俗经济学家们开始公开批评博士的过量生产，以及别的种类的学生的过量生产。他们争论说，如果经济萎缩的话，我们为什么应该把我们的剩余的资源用在具有可疑的使用价值的教育学位上呢^⑧？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研究生的占主导地位的形象一直对这个问题产生影响，即（如果能生产什么的话，）那么研究生究竟生产了什么。除此之外，这些形象还嘲弄了这个恐惧，即研究生可能实际上会对社会造成威胁，他们扮演着研究者的角色，并且愈来愈扮演着本科生的老师的角色，因而也就不是生产者，而是不受控制的复制者。

不受控制的研究生的形象，由女演员弗吉尼亚·马德森在恐怖影片《毒品贩子》中给最好地捕捉到了。她扮演了一个研究城市传说的社会学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发现，那个经常出没于卡布里尼公园的住宅区的毒品贩子不仅仅是一个童话，她看着镜子说他的名字遍，就可把他召来。但她的社会学的背景使得住宅区的一些居民怀疑这个传说，因而毒品贩子就再次开始杀人以便使他们再次相信。马德森所扮演的人物被指控犯下了由毒品贩子所做出的凶杀，但她又把一个黑人婴儿从一场可怕的大火中救了出来，从而挽回了自己的声誉。但大火也烧死了她，她又再次诞生，成了一种女毒品贩子，这个女人对她的爱玩弄女性的教授丈夫进行了一场令人满意的伤及皮肉的报复。这样一来，这个举止温和的研究生，本来是知识的创造者，最后却成了可怕的举动的复制者。

通俗文化中的研究生也被刻画成教室里的邪恶的复制者。在像《贝弗利山庄⁹⁰²¹⁰班》这样的电视片中，研究生助理教师愈来愈被刻画成勾引其学生的男女魔鬼。他们当中最具有女魔鬼性的人全都在贝弗利山庄⁹⁰²¹⁰班的1992至1993学年里，主要的人物就是在那一年上的大学。有一个迷人的人类学研究生，她恬不知耻地公开了她与一个社会学教授的“开放”婚姻。（她大概是在电视里使用准博士（已完成必修课程但尚未交论文者）期间的研究生的第一个人物。）她在⁹⁰²¹⁰班教女生的跨文化女权主义课，而在她的家里却勾引她们的男朋友——一年级学生布兰登·沃尔什以及那个专门造反的迪伦·麦凯。在这同一个时期，安德丽亚又被她的男性助理教师勾引了，那是一个乏味的、蓄长发的“在政治上正确的”家伙，其师德是可疑的。

尽管研究生的这些勾引并没有带来实际上的生育，但其含义却是，研究生可能对他们的学生产生危险的影响，不论是在教室内还是教室外。除此之外，这些研究生的性格刻画全都是反面的。在并非

明确是女性的时候，他们被女性化了，霍夫曼所扮演的那些懦弱的人物以及那个蓄长发的助理教师就是如此。所带给公众的信息是使人寒心的：小心研究生——他们可能学某种没有用的东西，可能会杀你，或者勾引你的孩子。

确实，大学的口传中充斥着真正的研究生凶手的故事——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数学研究生，他用一把锤子杀死了他的指导教师，而到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那个在联合国协会投掷炸弹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曾获得密歇根大学的最佳数学论文奖。但锤子和炸弹并不是普通研究生在实际生活中所选择的工具，不管我们可能会感到多么忿忿不平。因而仍然必须问一下：为什么传统上要用生殖、恐怖和懒散来表现研究生？什么使得研究生在通俗文化中如此可悲？如此危险？

对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是由耶鲁的迈克尔·丹宁教授向我暗示出来的，那就是，研究生院是在大学之内进行国内再生产的地方——大学自身通过研究生院被再次创造出来了。这就使得研究生院与大学内部的别的学院都不同：只有研究生院终生在大学的象牙塔之内培养学生。

这样一来，对研究生的反面展现，也就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的反面形象有某种共同之处。如果大学是为统治阶级涂擦圣油，或者浪费和滥用社会的公积金的具有威胁性或者危险的地方的话，那么研究生也就处于大学的危险的无用的核心。如果按照那位马拉松选手的导师的看法，历史教授就像一节节的香肠一样无用的话，那么公众又为什么应该为对美国政治中的暴政的另外一项研究或者对城市传说的另外一项研究提供资金呢？学术研究的使用价值是什么，而且又应该由谁来决定呢？

大学受到攻击，不仅仅是因为它被看作是生产有疑问的知识的地方，而且也因为它被看作进行危险的社会再生产的地方，在本科

生教育的领域尤其是如此。尽管 25 年前研究生教大学者甚少，但现在允许他们教的数量则反映了每一个学校的教学需要，而不是教员工作市场的需要。诚如一个国家级的劳动力听证会官员所说，在决定是否应该把研究生划分为可以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雇员的时候，“大学对助理教师的雇用显然更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不是学术上的原因”⁹。但对既要付学费又要纳税的家长来说，这个事实又是一个痛处：为什么会让研究生教本科生而教授们自己却似乎过着这样懒散而又舒适的生活？从纳税人和家长的观点来看，研究生出的毛病就是大学出的毛病，反之亦然。

研究生可能会在通俗文化中吃冤枉官司，但除了像我本人这样的研究生，甚至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模式，更不要说把它看做真正的危机了：对遭到歪曲而又具有误导性的研究生的形象，并没有一个反诽谤联盟来予以防范。而另一方面，迅速浏览一下在全国各地的研究生的激进主义就可看出，在越来越多的校园里有着在研究生的政治展现上的一个真正的危机。这些研究生对物质上的问题越来越不满，比如助理教师的报酬、教师培训、专业发展、医疗补助以及崩溃的工作市场。但最大的争议在于如何展现和权力。研究生一直要求，要对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大学的决策拥有更大的控制。

在研究生一直在给通俗文化的屏幕加热的同时，真实生活中的研究生也通过对工会的承认的运动给校园加了热。助理教师工会是 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生激进主义的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其行动包括工会选举、集会、示威、上课罢工和改卷子罢工。今天有 13 个校园，里面有得到合法承认的研究生教师工会，还有 5 到 10 个校园正在进行建立研究生教师工会的运动¹⁰。尽管这些活动很少进入到通俗娱乐的叙述之中，但近来的罢工，尤其是耶鲁大学的改卷子罢工，已经在通俗报刊里得到了大量的关注。

对研究生的展现，即使是具有文化上的多样性，也因而成了一个重大的校园问题；早在这些争议进入《纽约时报》以前，这些争议已经在校园里得到广泛的论争了。为组织研究生工会而战斗的研究生，也就不得不与一个反面的展现的形式战斗，那是一个比《贝弗里山庄 90210 班》里的好色的助理教师还要恶劣的形式：他们不得不与校方、本科生和教员所传播的有关研究生的反面形象进行斗争。在下面的一节里，我将检查这些形象中的几个，并对大学对孤独、可怕而又性欲过炽的研究生的刻板模式的造成所起的作用，提供一些阐释。

学院院长的报复

在我读研究生院的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卷进了带有“卡根-波利特计划”的令人恐惧的故事的工会运动。这个计划是以提出计划的学院院长名字命名的，它在研究生院的拨款结构上带来了大幅度的变化——开始实施在教学预算上削减 30%，增加了一个不太大的论文奖学金基金，并且限制了博士注册的时间。按照这个新的规定，研究生在过了他们的第六年以后就不被允许注册。尽管他们能够以后再交论文，但他们却不能获得这样的特权，如医疗补贴、延期偿付的贷款，以及对图书馆的使用。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改变，因为即使在 6 年中完成学业的研究生，也很少有人能在进入市场的第一年就找到工作。那个不太大的论文奖学金基金，并不能抵消这个 6 年规定所带来的贫困，或者抵消在助理教师位置的总数上的减少。尽管研究生已经为工会而组织起来了，但当卡根-波利特计划实施的时候，他们又前所未有地动员了起来，组织了集会，进行请愿，开展了一场积极的成员运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罢工，并且组织了研究生雇员和学生组织。

然而，比计划本身更具有毁灭性的，却是发明这个计划的校方的态度。唐纳德·卡根是耶鲁学院的前院长，杰罗姆·波利特是研究生院的前院长，他们经常是蔑视地谈到研究生。在解释那条6年规定的理由的时候，卡根声称，应该让研究生赶紧点，因为“钱正在被扔进老鼠洞里去了”。杰罗姆·波利特补充说，他是想帮助研究生完成他们的学位，“而不是在纽黑文过着一种吉卜赛式的生活”^①。可以这样认为，有了这样的学院院长，谁还会需要敌人呢？

我不久就得知，这些话是一种模式的一个部分。在耶鲁有一种刻薄对待研究生的文化，这种文化虽然是难以证明，但却为这里的研究生的持续愤怒火上加油，也为工会化的持续运动提供了燃料。有关这种刻薄的一些故事深深印在口头文化之中，从一代研究生传到另一代研究生那里去。人所共知，研究生院的一位副院长对因经济困难而来找他的研究生说，如果他们关心钱的话，他们就一定是“惟利是图”，而且“耶鲁也并非等候领救济食品的队伍”。见到这位副院长的我所认识的人，几乎都是流着眼泪离开他的办公室的。

这些事件影响了整个社区：如果它不是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也是发生在你认识的人身上。与刻薄的院长们所发生的这些冲突——往往发生在有关钱、医疗保健，或者注册的真正的危机之中——也就使得我们纳闷，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那么他们又为什么邀请我们来呢？确实，尽管通俗文化对研究生的攻击可能反映了对大学的普遍不满，但却难以认为耶鲁对研究生的态度系来自平民主义者的反知识主义。那么它究竟是来自何处呢？

一个答案就是，研究生并不适应那种使得耶鲁具有特色的大学文化。在要与哈佛有所区别的为时甚久的尝试中，耶鲁宣传自己是一所面对本科生的气氛融洽的文科学院，同时又有世界级的教员。耶鲁校方使得本科生感到自己非常特殊，并鼓励他们相信，有关耶鲁好的一切都是有利于他们的，那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和教育而

创造出来的。例如，我的大多数学生并不知道，研究生院是一个使得大学与学院不同的机构。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我们教课是有报酬的。在耶鲁的一个得到仔细保护的秘密就是，教授们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他们想指导研究生，同时又让研究生上课从而减轻他们的教学工作量^②。

但这并没有充分解释在耶鲁和耶鲁之外对研究生的不尊重这个更大的问题。然而，检查一下在耶鲁的校园里所流行的有关研究生的某些形象，也就有助于说明，导致研究生组织工会而校方又予以反击的是什么状况。令人足够惊奇的是，耶鲁校方用来描述研究生的辞令，与我在第一节所概述的通俗的展现传统如出一辙。在耶鲁校方看来，研究生，尤其是组织工会的研究生，就像在通俗娱乐节目中的研究生一样，是孤独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和无法控制的女魔鬼。

对于耶鲁的研究生工会运动，耶鲁校方作出了一个傲慢的解释：耶鲁的研究生是孤独的，而组织工会的运动实际上是对群体状态的一种寻找。这番话第一次是在1995年秋季对耶鲁的本科生的家长说的，当时耶鲁校长理查德·莱文和耶鲁学院院长迪克·布罗得海德试图向困惑的家长们解释，为什么在家长周末聚会的时候，竟会有几百个研究生（以及其他校园工人）在整个校园里游行，高叫、示威^③。校方解释说，对这种孤独的矫正方法就在手头，而那并不是工会。相反，他们许诺要为研究生建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和文化中心。如果研究生能有机会进入一个社区中心的话，也许他们就会放下他们的纠察队的告示牌，也许他们的抱怨就会烟消云散了。

但在校方对我们的孤独提出了这个关心的同时，他们也对我们的性生殖的能力提出了关心。在过去的6年里，研究生院的每一个继任的院长都声称，研究生医疗保健的高价格是由于研究生生了“越来越多的婴儿”所造成的。按照这些院长的说法，这些婴儿是

非常昂贵的，他们使得研究生的医疗保健的总的费用如火箭般上升。最近的一次对这一点的断言，是由研究生院的现任院长汤姆·阿普尔奎斯特，在1995年的一次与研究生雇员与学生组织会面的时候做出的。他的话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研究生是孤独的吗？还是研究生有太多的性生活？我们能够既孤独得可怕，又怀孕数量多得可怕吗？³⁵

为了不使自己陷进一种悖论之中去，校方又提出了一个摆脱掉这个辞令的困境的方法。1996年春，在耶鲁助理教师所进行的一次为期一周的罢工的过程中，研究生院院方开始使用“补贴计划”这个短语，来描述对研究生的拨款。在与校园报刊的一次会晤中，副院长乔纳斯·兹丹尼斯声称，“在耶鲁进研究生院是免费的”，而院长阿普尔奎斯特院长则说，“那是不可思议的。那是一种补贴计划”³⁶。“补贴”一词与福利有着强烈的联系，阿普尔奎斯特使用“补贴”一词，也就使得研究生有可能既是孤独的又怀孕，因为没有人能比女魔鬼式的福利母亲更孤独，或者更怀孕了。

说校方把研究生看做有闲阶级的福利母亲，这或许是太过分了，但我认为，他们的话却让研究生的标准形象在人们脑海中浮现出来了——那是孤独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和好色的助理教师——而这又是出于几个原因。首先，在涉及到公共关系的时候，大学在谈到研究生的时候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如果大学试图说明研究生只不过是学生，那么他们又须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研究生又与本科生不一样，并不付学费。他们须向那些家长证明他们的“补贴计划”是有道理的，那些家长并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孩子每年的学费高达35,000美元，而研究生几乎不交学费，还经常会领到薪金。

另一方面，如果大学试图证明下述事实是有道理的，即研究生之所以领到额外的补助，是因为他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教学，那么他们就必须承认那个没有几个大学愿意承认的事情：即在

现代的研究大学里，研究生做了绝大部分的一对一的密集性教学工作，以及大量的批改作业的工作。一个近期的对耶鲁的研究生教学所做的研究发现，与享有终身职位的阶梯式的专职教员相比，研究生每周呆在教室里的时间更多^⑨。在州立大学里，情况甚至更加令人吃惊。例如，卡里·纳尔逊估计，在位于厄巴纳-香潘的伊利诺伊大学，单是取代在英语系里由研究生所承担的教学，每年就要花4百万美元来雇用专职教师^⑩。甚至小一些的学校，例如位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城的卫斯理大学，就允许教授把他们的费力的考试和改卷子工作交给临近大学的研究生去做，例如耶鲁的研究生。

这个对研究生教学的沉重依赖，加上令人忧郁的工作市场，也就把研究生院变成了某种为了本科生的利益而“替美国教学的”项目。研究生往往是有才能和具有奉献精神的教师，但他们在研究生院里的教学经历，加上他们的博士学位，并不能保证他们能得到学术性的工作——或者任何别的种类的工作。

校方不能向公众承认这一点，不能向他们所招收的研究生承认这一点，甚至也不能向他们自己承认这一点。在因为日见下滑的经济状况，他们的工作被大幅度地减少，而研究生又是一个容易受到打击的目标。报考研究生院的学生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大学教学的需要也每年都在增加，这就使得研究生容易受到金融缩减的影响。研究生甚至并没有教授们的有限的集会的权力，也没有本科生的潜在的挣钱的能力（因而也就没有潜在的校友捐赠的能力）。当研究生通过组成工会来争取权力的时候，校方也就更容易说，这是因为研究生是享有特权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这是一种通俗文化会予以支持的观点。

耶鲁校方在这个无赖的陈列室里又增加上几个形象，把研究生雇员和学生组织里的研究生描绘成忘恩负义的学徒和贪婪的孩子。耶鲁校方利用了这后一个形象，因为他们似乎乐于把他们的热衷于



图一 乔恩·卢卡斯为《耶鲁先驱者报》画的卡通画,1995 年 4 月 7 日,第 7 页。获准转载。

图中的文字为“GESO= 研究生雇员和学生组织

JON LUCAS / YH= 乔恩·卢卡斯 / YH=《耶鲁先驱者报》

工会的助理教师,展现为伟大的母亲耶鲁的爱发牢骚的、忘恩负义的继子。在一幅卡通画里(图一),研究生雇员和学生组织被画成了一个手拿拨浪鼓尖声喊叫的学步的儿童。尽管本科生往往是那些哭叫的人,确实是为他们的分数而哭叫,但我以为,对他们来说批评研究生雇员和学生组织要比批评耶鲁容易一些。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未来投资到了这所大学的声誉,因而我们竟会用我们的以街道为方向的、让新闻界来收集资料的游行示威、集会和罢工来暴露耶鲁的虚伪,也就令他们感到害怕^⑧。

还有一幅卡通画,是研究生在期末的时候拒绝上交分数的时候发表的,在这幅画里,研究生雇员和学生组织被画成了一个体格庞大、戴着面具、赤裸着胸脯且长毛的行刑人,那人拿着一把刀,刀子上写着“改卷子罢工”,那把刀指着一个颤抖的“本科生约翰·Q”



图二 戴维·A·穆尔为《耶鲁先驱者报》画的卡通画(1995 年 12 月 8 日),第 4 页。获准转载。

图中的文字为:GESO= 研究生雇员和学生组织

GRADE STRIKE= 改卷子罢工

WHY DON'T YOU GUYS LIKE US? = 为什么你们这些家伙不喜欢我们?

FLEX BOYCOTT= 抵制‘灵活’膳食计划

JOHN Q.UNDERG.= 本科生约翰·Q

(图二)。在这幅卡通画里的那个本科生已经被刺中了,是校园里的另外两个工会把他留在那里的,那两个工会试图结束为本科生准备的一个得人心的‘灵活’膳食计划,那个计划涉及到当地的餐馆。但在这幅卡通画里的明显的恶棍,却是那个戴着面具的行刑人,即研究生雇员和学生组织,他天真地问道:“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喜欢我们?”^⑧尽管这幅卡通画呈现出了一个可怕的面容,但那个行刑人的问题却是研究生雇员和学生组织的成员们所频繁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本科生不喜欢研究生雇员和学生组织?尽管我们已适应了这个事实,即我们的教学不被作为一个机构的耶鲁所欣赏,但我们仍愿意被我们的学生所欣赏,起码不被我们的学生所嘲弄。

这两个形象都能够与通俗文化中的研究生的刻板模式联系起来:如果那个婴儿是遭到遗弃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那么那个行刑人(到目前为止他有了“胸脯”)就是那个疯狂的、女性化了的杀

手。虽说每一批选区居民都有选择这些约定俗成之物的自身的理由，但对耶鲁的本科生来说，这些形象的残酷性被两个因素给火上加油了：一是我们对他们的分数所拥有的权力，一是他们害怕，他们的未来会就像我们的现实一样凄凉。他们中有许多人想进研究生院，或者起码进专业学校，但如果他们承认我们的抱怨是合理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承认，他们的未来也可能就像我们的未来一样。他们也会变成孤独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或者是有闲阶级的福利母亲。他们也会需要一个工会。

除了对研究生怀有这种恐惧和不满之外，耶鲁的许多本科生还赞同校方的见解，即研究生教师是廉价劳动力，能够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在那次该卷子罢工的争议达到高潮的时候，《耶鲁每日新闻》的刊头社论指控研究生背叛，坚持认为，“参加这种罢工的研究生在教室里没有位置，不值得拥有给耶鲁的本科生改卷子的特权”^②。这个令人吃惊的说法表明，本科生是把研究生看做他们的教育上的仆人，把改卷子看做一种洋洋得意的愉快。

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的就是，改卷子是最乏味的一种工作。事实上是太乏味了，以至于许多资深教师不想做它——起码不是很想做它。这是耶鲁的研究生通过拒不改卷子所揭示出来的秘密。这次改卷子罢工与以前的为期一天或者一周的罢教不同，它揭示出，对至关重要于校方和学生的那个教育金块——也就是万能的分数，耶鲁的教授们所拥有的控制是多么的少。尽管大多数资深教员在上课的时候与本科生没有多少接触，但那场改卷子罢工却触动了耶鲁全体教授的防御的神经；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底是谁“拥有”分数，以及谁“拥有”试卷和考试。分数是属于本科生、属于选择教科书并上该门课的教员，还是属于改卷子并给出最后的分数的助理教师呢？许多教授对他们的助理教师说，“你不能不给分数，这是我的一门课”。但在改卷子的任务被多达 16 个助理教师分担